

巴以和平进程的失败:平衡与不平衡因素*

乌利亚·沙维特**

陈艳艳***译

【摘要】本文分析了巴以和平进程屡次失败的原因。基于对巴勒斯坦历史背景的分析 and 人口结构因素影响的思考,本文认为战略框架下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独特局势是造成巴以问题持续僵局的主要原因。虽然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居于人口弱势地位,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人口均势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人口的巨大差距,让巴勒斯坦确信以色列的战略处境将会恶化,因此不愿意放弃在巴以问题上的教条式议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针对此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结合《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分析巴以问题的前景。

【关键词】巴以冲突;《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哈马斯;中东人口统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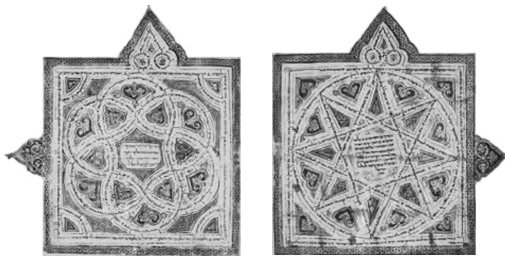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q)对聚集在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布城(Putrajaya)一座清真寺外的数千名穆斯林说:

穆斯林有 16 亿,犹太人只有 1300 万。16 亿穆斯林输给犹太人是没理

* 本文最初发表于 *The Journ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pring 2018);《亚伯拉罕协议》签订后,作者在原文基础上进行补充并形成此文,补充内容主要在文章的“结论与相关的策略建议”部分;感谢 Amir Oneli 和 Carl Yonker 对本文撰写的协助。

** 乌利亚·沙维特(Uriya Shavit),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与阿拉伯研究系教授,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系和宗教研究研究生项目负责人,代表著作有 *Islamism and the West* (Routledge, 2014)、*Shari'a and Muslim Minor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Zionism in Arab Discours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Freedom in Islam* (Routledge, 2017)。

*** 陈艳艳,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



由的。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就会被瞧不起。^①

虽然拉扎克没有具体说明这样的团结应如何,也没有言明全世界的穆斯林应该怎么做才能重建伊斯兰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但他却揭示了一个问题的深层真相,那就是为何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数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和其他旨在结束世界上最顽固冲突之一的倡导者们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提出了类似的方案。作为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久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唯一现实途径,这一方案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在1967年占领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对东耶路撒冷拥有某种形式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回报,巴勒斯坦领导人将承认大约50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并且其他阿拉伯国家将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巴以和平努力的屡次失败并没有引起对长久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阐释的反思。这一历史阐释试图说明为何世界上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谈判代表都不能让巴以双方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一些曾参与其中并为缔造巴以和平而努力的人感叹“错失良机”,认为曾经巴以双方确实建立起了彼此认可的、解决问题的框架,并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妥协与共识;但遗憾的是,政治环境和相关因素的欠缺阻碍了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②事实上,这种被广为接受的历史阐释却忽视了在巴以问题上失败的重复性。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不同的谈判团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却都陷入了相似的僵局,这就说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个人或环境因素。

另一种阐释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势力。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一方面哈马斯崛起并发起伊斯兰抵抗运动,其将整个巴勒斯坦都视为穆斯林的领土,并公开宣称以消灭以色列为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以色列宗教右翼中的弥赛亚思想使妥协成为不可能,因为根据这一派的思想,他们是以上帝之名

^① Hannah Beech, “Malaysian Leader Says Muslims Should Not ‘Lose to the Jew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 2017).

^②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有人认为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遇刺在很大程度上是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的原因,参考以色列中东研究学者、前驻美大使和首席谈判代表伊塔玛·拉比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的观点: Aluf Ben, “Arafat Is Guilty — But Only He Can Do It,” *Haaretz* (March 30, 2004); 另见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萨义伯·埃雷卡特(Saeb Erekat)在以色列媒体专栏上的观点: “If Rabin Had Not Been Assassinated, There Would Have Already Been Peace,” *Walla* (October 17, 2002) [Hebrew]。另一个例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声明,他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再执政两个月,和平就可能实现(奥尔默特在2008年9月因腐败丑闻辞职),参见“Abbas: Palestinians, Israel Were Two Months Away from Inking Peace Deal,” *Haaretz* English Edition (October 14, 2012); 对这一观点的批判评论参见 Elie Podeh, *Chances for Peace: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5), 35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说话、作为上帝的载体行事并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是不太可能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的^①。然而,这种理论存在三点缺陷。第一,穆斯林兄弟会及包括哈马斯在内的派系,并没有宣扬要对所有占领穆斯林土地的非穆斯林“侵略者”发动无限期的战争。如果他们有此宣称,就应该也在西班牙和塞尔维亚发起圣战。第二,犹太人的弥赛亚政治观虽然在整个以色列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就支持这种观点的以色列议会议员而言,其人数仍较少。即使在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第20届议会中,也只有不到10%的议员公开认可这一观点,即认为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以色列政府绝不能让出其于1967年占领土地的分毫。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自1993年以来,始终是中间派、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以色列政府(而非极端派系)和在巴勒斯坦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在努力实现最终协议,并且不断失败。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都已经表明,以色列中左翼愿意让与巴勒斯坦的利益上限远低于巴解组织愿意接受的利益下限。

2000年7月举行的戴维营会谈曾被视为很有望实现巴以间的最终和平协议。以色列的一名曾参与会议的谈判代表指出了此次谈判破裂的原因。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表示,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领导的鸽派政府的策略是利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大部分犹太人定居点来换取巴勒斯坦在“回归权”上的让步,并将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解决。但是让以色列代表团震惊的是,巴勒斯坦在“回归权”问题上十分坚持己见。巴勒斯坦代表团的一名谈判代表哈桑·阿斯夫(Hasan Asfur)回应称上述的构想纯属虚构,巴勒斯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回归权”问题上让步,他们也从来没有让步过。^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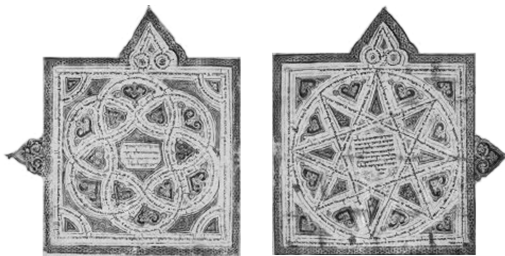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实际上,在过去的25年里,巴解组织领导人对难民问题不是提出模棱两可的办法,就是重复阿斯夫的教条主义立场。^③民主选举的以色列政府不可能同意这一要求抑或类似的折中要求来造成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返回以色列,并威胁到以色列犹太人国家的主体性。

巴以和平问题上的僵局不仅引起了普遍的失望,也赋予了双方尚武、善变、

① 例如,“双方的极端势力”让“温和的多数派”希望落空的观点支撑了以色列工党和反对派领袖艾萨克·赫佐格(Isaac Hertzog)在2016年提出的和平计划,参见Isaac Hertzog, “Only Separation Can Lead to a Two State Solu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16)。

② 参见Uriya Shavit and Jalal Banna, “Everyth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Right of Return and Were Afraid to Ask,” *Haaretz Magazine* (July 6, 2001)。

③ 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致力于“在联合国第194号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公正和商定的解决办法”,并且符合2002年的阿拉伯联盟和平计划。教条主义的立场认为“回归权”是难民的一项个人权利,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不能让步。近年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曾明确表达过这两种观点。参见Elhanan Miller, “Abbas Hardens His Stance on Palestinian ‘Right of Return,’”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3, 2014)。



欺骗和妄想等色彩。具体而言,在当代以色列政治中,关于不切实际的巴勒斯坦教条主义的要求,特别是关于“回归权”的看法问题,最流行的一种表述就是巴勒斯坦从不错过任何“错失机会”的机会。这一引自以色列前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的知名言论,反映出了以色列人对冲突中的显著弱势方却提出阻碍实现巴勒斯坦独立的要求的费解。这种困惑不一定关涉历史正义、政治合法性和人权的具体层面,而是反映出一种期望,即希望明显弱势方的巴勒斯坦人能够少一些教条主义,并着眼于更可实现的现实目标。

关于巴勒斯坦教条主义和战略盲目性的本质主义看法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力量对抗比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巴勒斯坦主流的教条主义做法也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理性,虽然这有损于他们眼前的国家利益,也可能有损于他们的长期利益。

下文将分析巴以冲突中存在着平衡与不平衡因素的特殊现象,并认为这种现象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主要障碍。在此基础上,还将探讨本文对巴以未来和谈的可能性影响。

一、巴以冲突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因素

从广义上讲,有两种情况能够促进国家间暴力冲突的解决(达成涉及领土或其他争端的双方协定)或不被挑战的现状的继续存在(虽然冲突尚未解决,但敌对双方都不使用暴力或其他举措来挑战现状)。一种情况是有关各方出现持续的力量平衡,使战斗或继续战斗成为徒劳。也就是说,敌对双方都没有可以改变平衡以有利于自身的现实途径,而如果战斗继续则双方又都将冒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平衡就成为双方妥协的强大动力。1988年两伊战争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促使冲突解决的另一种情况是有关各方的力量存在明确且显著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较强一方有能力将其条件施加于较弱一方,而后者在无力进行有效对抗的情况下选择投降。1945年,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向美国投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要让平衡和不平衡的现象有助于解决冲突,其关键是至少冲突的一方承认该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并不能保证冲突的结束,因为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判断并非始终都是理性的。为什么非自由主义政权比自由民主政权更容易卷入侵略战争?为什么在整个现代史上后者几乎赢得了所有与非自由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自由主义制度为反对变化无常、毫无根据的判断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正确评估冲突中各方力量间的平衡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为哪怕是精细的、无情绪的计算机程序也无法准确评估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所有因素。国家的军事实力通常是基于战斗机、坦克和潜艇的数量及性能等可衡量的因素,但隐性层面的因素,诸如特定情况下某个将军或排长的敏锐度、步兵的积极性等也是重要方面。军队的武装实力是任何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它只是影响冲突进程及结果的一个方面。工业、金融、外交、技术、人口以及环境等资源与条件也是至关重要且直接相关的。让评估变得更为复杂的是,不同的权力变量是相互联系的并有可能在冲突中发展变化。例如,不直接参与冲突的第三国的政治发展可能造成对冲突一方的外交及经济制裁,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对其军工产出或士兵的积极性产生影响。同样,在某种气候条件下无关紧要的科技装备可能在另一种气候条件中变得至关重要。^①

我们很容易把巴以冲突的现状看成一个典型案例,即对力量平衡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评估导致其中一方(巴勒斯坦人)未能采取更加理性和务实的行动方案。换言之,在冲突的最初形成阶段,对双方实力和弱点的误判导致了巴勒斯坦的悲剧。如今巴以双方的实力差距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且没有争议。以色列军队有 718250 名士兵(包括预备役士兵)、2620 辆坦克和 652 架战斗机。据推测,以色列还拥有数十枚原子弹,并发展了从海上进行“二次打击”的能力。^②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当局指挥着一个几千人的安全机构,其主要装备为小型武器和轻武器;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军事武装则由几千名民兵组成,其主要战略武器是自产和走私的火箭弹。^③ 在经济层面,以色列的人均 GDP 为 34800 美元,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人均 GDP 仅为 4300 美元。^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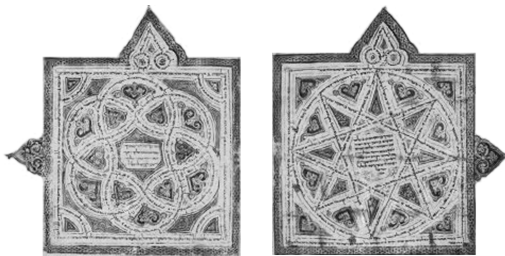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在外交上,以色列的合法性地位及其外交政策(并非所有政策)得到了世界大国美国而且是两党层面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欧洲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国家德国的坚定支持。这两个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都有历史和文化渊源,不会轻易消失。除此之外,近年来以色列还与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及印度建立了密切关系。相反,无论是约旦河西岸还是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都没能得到任何大国类似

^① 关于这一点的经典讨论,参见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Boston: MacGraw-Hill, 2006), 163-175。

^② 参见 Hans M. Kristensen and Robert S. Norris, “Israeli Nuclear Weapons, 2014,”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70 (2014): 102, 108。

^③ 参见 Eado Hecht and Eitan Shamir, *Medium-Intensity Threat: The Case for Beefed-Up IDF Ground Forces* (Ramat Gan: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6), 24; Yiftah S. Shapir, “Rocket Warfare in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in *The Lessons of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eds. Anat Kurtz and Shlomo Brom (Tel Aviv: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2014), 43。

^④ 参见“The World Factbook 2017-GDP Per Capit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



的支持。在以色列建国的前 30 年中,巴勒斯坦曾寄希望于阿拉伯国家能联合起来为它的利益发声并采取实际行动,如今这一希望几乎破灭了。这些事实清晰地表明,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巴勒斯坦都没有任何可能的机会来通过军事冲突消灭以色列,或者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改变以色列国的犹太属性。

尽管如此,在综合国力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个因素——也是唯一因素——使巴勒斯坦的教条主义成为合乎理性的做法,那就是人口因素。巴以冲突的人口统计数据有两层战略上的含义:第一,它意味着尽管以色列有实力,能让全面的暴力升级以其决定性的胜利而告终,但却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第二,它提供了一个理性基础,可证明未来的力量平衡现象将向有利于巴勒斯坦的方向转变。

二、人口统计数据对巴勒斯坦教条主义的影响

在 19、20 世纪之交,世界上大约有 1600 万犹太人,这一人数不比埃及和整个新月沃土上的居民少多少,而且比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要多很多。当时,以《巴塞纲领》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体现了一种使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变为少数派的人口结构转型的潜在性。1898 年,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的喉舌《光塔》(*al-Manar*)的编辑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就已经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将使当地居民屈从于犹太人的统治。里达后来成为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s)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的导师。然而,就连里达也没有预见到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潮。^①

虽然 1917 年 11 月 2 日的《贝尔福宣言》遭到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强烈谴责,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抵制仍相对温和。不过,这种不抵抗并不代表彻底的盲目。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大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年里,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迁移到了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土地,甚至在 1924 年美国的大门对犹太移民关闭时,情况也是如此。^② 尤其在 1927 年,离开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比进入该地的犹太人多 2000 人,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的前景产生了怀疑。^③ 犹太复国主义者悲伤地认为,赫茨尔(Herzl)

^① 参见“Khabar waI'tibar,” *al-Manar* 1 (April 1898): 105-108。

^② 参见 Joseph Nevo, “The Palestine Arabs’ Attitude towards the Yishuv and the Zionist Movement,” in *Zionism and the Arabs*, ed. Shmuel Almog (Jerusalem: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Israel and the Zalman Shazar Center, 1983), 154。

^③ 参见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London: J. Murray, 1999), 10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关于犹太人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迁徙到以色列地的设想看来不太可能实现了。

始于1936年的阿拉伯起义源于一系列事态发展的影响,包括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普遍兴起的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场起义首要还是对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潮(第四次和第五次移民)的回应,这几次移民潮使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增加到近50万人,并且让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梦想成为可能。^①虽然英国通过武力平息了这场起义,但随之而来的反纳粹的世界大战让阿拉伯世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1939年5月,英国发布文件要求将五年内的犹太移民限制在75000人以内,以避免数百万欧洲犹太难民迁居巴勒斯坦地区使当地阿拉伯人成为少数派。阿拉伯世界的这一举措导致了犹太人的双重悲剧。于是,在受迫害的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避难所的历史时刻,避难所却不存在;在犹太人有很大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民族主体性地位的历史时机,他们的努力却遭到了阻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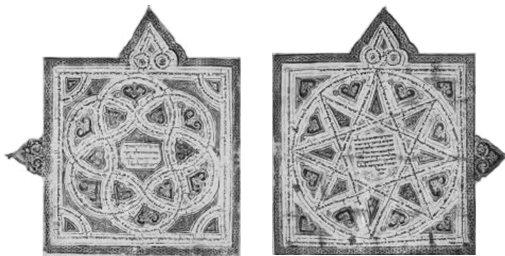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1947年11月30日,在联合国大会批准巴以分治决议后不久爆发的那场战争中,依据所有可衡量的参数,特别是人口统计学数据,双方的力量博弈似乎都有利于阿拉伯一方。首先,60万犹太人要面对两倍多的巴勒斯坦人。其次,1948年5月英国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后,犹太人要面对七支装备精良的阿拉伯国家军队,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约为4000万人,其中包括约有2000万人口的埃及。^②这种人口数量上的不平衡被视为阿拉伯国家能轻松制胜的决定因素,甚至导致美国一度收回了对犹太民族独立事业的支持。^③简而言之,传统的观点认为战略装备更好、人口是对方60多倍的一方是不太可能战败的。然而,1948年中东战争的结果证明评估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是十分复杂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说阿拉伯人对其能够轻松制胜的前景是基于毫无根据或天真分析的误判。

1967年第二次阿以战争的结果再次证明人口数量的差异不一定能决定冲突的结果。在这场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取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并将实际控制的领土扩大三倍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战争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角度,不论谁该为这一进展负责,1948年中东战争的一个重要获

① 参见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121-122;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S. Migdal, *Palestinians: The Making of a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4-116.

② 参见 Ami Ayalon, "Demography, Politics, and Tradition in Mubarak's Egypt," in *Demography and Politics in the Arab States*, eds. Ami Ayalon and Gadi Gilbar (Tel Aviv: Moshe Dayan Institute,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Hakibbutz Hameuchad, 1995), 30 [Hebrew].

③ 例如,杜鲁门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引用的对杜鲁门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James Forester)的评价,参见"A Nation Reborn," *Pillar of Fire*, Episode 7, minute 15:40.



益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最终占领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口数量仅为犹太人口的25%。^① 随着此后三年的犹太移民潮,这一比例降至10%左右。如果阿拉伯方面当初接受了联合国的巴以分治计划,就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因为根据该计划,在最初要建立的犹太国家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数量几乎是相等的。^②

然而在1967年,这一人口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280万名以色列公民(其中约40万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直接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110万名巴勒斯坦居民。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有15万名犹太人从苏联移民至以色列,但直至1980年,这一人口差距仍较为稳定。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约有140万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口近390万名(其中约60万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到1985年,约旦河西岸约有157万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口约为430万名(其中约75万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③

在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领的20年后,西岸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差异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勒斯坦领导人对巴勒斯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徒劳努力感到沮丧,并认识到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的控制实际上是无法挑战的,于是转而认可另一条道路,即巴勒斯坦人口的增长可能是削弱甚至击败以色列的关键因素,虽然他们并不确切清楚人口数量结构将如何导致战略局势的改变。例如,在1987年第一次阿拉伯大起义开始前不久,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曾宣布巴勒斯坦妇女是“生物炸弹”,她们将从内部引爆并摧毁以色列社会,因为到2000年“巴勒斯坦人口数量将超过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④。

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于以色列而言是一种战略风险,因为有可

① 参见 Benny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Arab Infiltration, Israeli Retaliation,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 Suez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2-5。

② 参见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184。

③ 参见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16* (Jerusalem: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6), 34 and chart 1 [Hebrew];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Gaza Strip and the West Bank,”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data-tools/demo/idb/region.php? N = % 20Results%20&T=13&A=both&RT=0&Y=1967,19 80,1985,2000,2010,2018&R=-1&C=GZ, WE](https://www.census.gov/data-tools/demo/idb/region.php?N=%20Results%20&T=13&A=both&RT=0&Y=1967,1980,1985,2000,2010,2018&R=-1&C=GZ,WE)。

④ Wajih abuDhikraa, “al-Qunbula al-Biulujiyya al-Filastiniyya,” *al-Akhbar* (July 3, 1987): 16; Uri Sadot, “The Politics of Demography and Partition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 2016), [https://www.georgetow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org/online-edition/the-politics-of-demography-and-partition-in-israel-and-palestine? rq = The% 20Politics% 20of%20Demography%20 and%20Partition%20in%20Israel%20and%20Palestine](https://www.georgetow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org/online-edition/the-politics-of-demography-and-partition-in-israel-and-palestine?rq=The%20Politics%20of%20Demography%20and%20Partition%20in%20Israel%20and%20Palestin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能导致更严重的人口均势问题。这一观点来源于阿拉伯人^①、美国人^②，特别是以色列领导人的类似评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中左翼已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以以色列对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长期控制正在造成“人口威胁”，并将这个问题作为战略关切的重点。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将最终迫使以色列在两个恶果间做选择：要么给予巴勒斯坦人充分的公民权利而失去国家的犹太特性；要么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但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国家的民主特性，也会损害其国际合法性地位。^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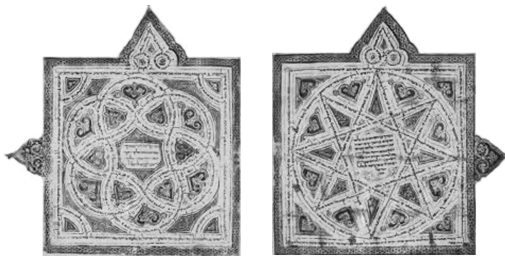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1993年9月，左倾的以色列政府与巴解组织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的提案为以色列提供了一条道路，使其可以在避免人口数量结构影响的同时不需要作出多少让步。该协议设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些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自治的、准选举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非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强制以色列撤出犹太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也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但是这项协议的签署并未使巴勒斯坦在人口数量结构方面有任何让步。而且，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这条以色列的“逃生路线”只是暂时的，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在五年内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核心问题并达成最终协议。^④因此，奥斯陆进程为巴勒斯坦继续提出要求打开了大门，这些要求于他们而言有助于消除犹太人民族家园的以色列国；同时，也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更有效的外交和暴力手段来促进这些要求的实现。事实上，在签署协议之后，巴勒斯坦领导层立即澄清说他们并不认为《奥斯陆协议》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步骤，而只是

① 例如，埃及外交部长马吉德(Ismat Abd al-Majid)指出，人口问题是以色列无法维持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控制的原因，参见“Majid Ended His Visit in Israel in a Meeting with Palestinian Personalities,” *Haaretz* (July 16, 1987): 9 [Hebrew]。

② 例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的评论，参见“Time Bomb,” *Haaretz* (July 16, 1987): 9 [Hebrew]。

③ 参见1988年第12届议会选举中工党领导的议会成员名单(Ma'arach)纲领，第7—8页；另见时任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话：“‘领土’意味着我们属于它，它也属于我们的土地。他人定居的土地不能被视为‘领土’……我赞成让步——我认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国成为多数派的情况。”Amos Ben-Vered, “Peres: ‘I Am Conceding the Scenario of an Arab Majority in Eretz-Israel,’” *Haaretz* (July 16, 1987): 3 [Hebrew]。

④ 参见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Interim Self-Government Arrangements* (Jerusale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3), 21-23。



将其视为最终击败犹太复国主义的手段。^①

随着和平进程的动摇,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有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大批犹太移民进入以色列,但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正在迅速地进入人口均衡的局面。到 2000 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有 310 万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口为 640 万(其中 100 多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到 2010 年,巴勒斯坦人口数量为 390 万,以色列人口为 770 万(其中近 150 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② 虽然学界对约旦河西岸实际居住的巴勒斯坦人口数据的可靠性有所质疑,但其他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不违背在巴勒斯坦地区曾经存在着两个几乎均等的种族这一事实。^③ 与此同时,该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数量之间的人口差距也迅速扩大。1967 年,世界上有 1.12 亿阿拉伯人,犹太人约为 1300 万人,其中以色列犹太人不足 250 万人。到 2015 年,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口增长到 4 亿人左右,与之相比,犹太人只有 1600 万人,其中 600 多万人生活在以色列。^④

如果说 1948 年和 1967 年的两次战争的战略启示是人口不一定决定冲突的结果(这也是国际关系中一条普遍原则),那么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间的人口均势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数量的巨大差距又如何为巴勒斯坦的教条主义提供合理性依据?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如此确信一旦和平的努力失败,以色列的损失会比他们更大?

首先,目前的人口统计数据让巴勒斯坦人相信安全形势的恶化将导致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直接且全面的控制,这将再次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在它于 1993 年通过签署《奥斯陆协议》而摆脱的“两个恶果”之间作出战略抉择。

^① 例如,亚西尔·阿拉法特在 1994 年 5 月的约翰内斯堡演讲中,将《奥斯陆协议》与 628 年的《侯代比亚和约》(*Hudaybiyya Treaty*)作比较。《侯代比亚和约》是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加的古莱氏部落(Quraysh tribe)之间的一项为期 10 年的停火协议,该协议在签署两年后破裂并导致穆斯林占领麦加。参见 Ofira Seliktar, *Doomed to Failure? The Politics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Oslo Peace Process* (California: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9), 55; PalMediaWatch, “Arafat Publicly Denounces and Rejects the Oslo Accords in Speech in Johannesburg,” on YouTube (September 19, 20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Xdm6mGS2U>。

^② 参见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16* (Jerusalem: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6), 34;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Gaza Strip and the West Bank,”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data-tools/demo/idb/region.php?N=%20Results%20&T=13&A=both&RT=0&Y=1967,1980,1985,2000,2010,2018&R=-1&C=GZ,WE>。

^③ 例如, Bennet Zimmerman, Roberta Seid, and Michael L. Wise, “Voodoo Demographics,” *Azure* No. 2 (Summer 2006): 61-78。

^④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region/arab-world7view=chart>; Itamar Ichner, “Jewish Worldwide Population in 2015 is Nearly 16 Million,” *Ynet* (June 25, 201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其次,直接控制数百万与之对抗的巴勒斯坦人将会耗尽以色列的人力资源。

自2000年戴维营和谈失败以来,巴勒斯坦温和派领导人的传统认知是如果以色列再次直接对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进行控制,国内外压力将迫使它接受在约旦河西岸一个民主国家的出现,该国家须为所有公民提供充分和平等的权利,并最终拥有一个阿拉伯人占显著多数和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府。因此,以色列如果动用军事手段或其他力量将事实上导致这一局面。举例来说,巴勒斯坦谈判代表兼耶路撒冷事务部长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al-Husseini)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于2001年去世前不久说:

我担心的是今天,而以色列人应该担心的是未来。今天,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愿意放弃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80%的土地,以换取以色列承认其在余下的20%土地上的全部权利。十年后,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的两个民族将出现人口数量上的均等。30年后,巴勒斯坦人将成为多数。到那时,他们可能会既想要权利也想要土地——在西耶路撒冷、海法、阿卡和雅法。^①

巴勒斯坦前谈判代表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在2013年表示:

如果局势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最终我们将成为多数,但我们要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明白巴勒斯坦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民主国家,并且这个国家与以色列为邻。^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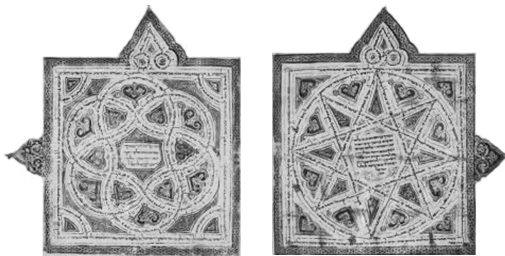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以色列议会成员、阿拉法特的前顾问艾哈迈德·提比(Ahmad Tibi)甚至宣称结束两国解决方案将导致一国解决方案并会让他获选总理。^③

以色列只有两种选择——巴以两国方案或结束其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自

① Graham Usher, "Mourning the 'Son of Jerusalem': Faisal al-Husseini," *Jerusalem Quarterly File* 11-12 (Winter 2001): 13.

② Abd al-Qadir Fares, "Ashrawilil-'Okaz: al-Hukuma al-lisrailliyya al-Muqbila Istitaniya Mutatarifa, wal-Inqisam al-Filastiniilaa Zawal," *Okaz* (January 21, 2013).

③ 参见 Carolina Landsman, "The Arab Lawmaker Vying to Be Prime Minister of a Utopian Israeli-Palestinian State," *Haaretz* (March 2, 2017); Ahmad Tibi's interview for Amanpour, "Arab Israeli MP Warns of Dangerous Regression," *CNN*, <http://edition.cnn.com/videos/world/2017/02/15/intv-amanpour-ahmad-tibi-israel.cnn>.



从2000年戴维营和谈破裂以来,阿拉伯温和派领导人^①、以色列政治家^②、亲以色列的欧洲领导人如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③、包括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k Obama)^④和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⑤在内的美国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巴勒斯坦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这一复杂局面的影响常常被忽视。如果如巴勒斯坦温和派领导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以色列只能在两国方案和国家消亡之间做选择,那么巴勒斯坦就可以在两国方案上强加条件,并且无须在以色列接受这些条件之前急于行动。

2010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ud Abbas)警告说,如果和平谈判失败,他将告诉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来结束这一切。^⑥

阿巴斯的话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虽然通常在战争中独立的完全丧失意味着终极失败,但以色列比巴勒斯坦更需要担心巴勒斯坦自治的瓦解。事实上,以色列的政策已经表明,不论巴勒斯坦挑衅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以色列都认为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做法是不计代价地避免以色列对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永久的、直接的统治。在2014年夏天针对加沙的“护刃行动”中,以色列明确的战略目标是在哈马斯继续掌权并完全控制加沙地区的情况下结束行动。^⑦究其原因,以色列不仅担忧重新占领和控制加沙可能引起的人员伤亡,而且也考虑到要维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所涉及的财政费用以及外交方面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算计,尽管不那么明显,那就是对巴勒斯坦基于人口因素的教条主义的合理解释。阿拉伯国家可能联合起来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是以色列建

^① 例如,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鲁斯·加利(Boutros Ghali)的采访,参见 Volkhard Windfuhr, “Israel Has a Habit of Closing Its Eyes to Hard Facts,” *Der Spiegel* (January 5, 2009)。

^② 参见 Zehava Galon, “Israel Will not Become a Bi-national State,” December 7, 2015, <https://www.facebook.com/zehavagalon/photos/a.115819311841766.24622.115028251920872/102312744444277/?type=1&-theater> (Accessed on January 23, 2018); Aviel Magnezi and Gilad Mora, “Jewish State Law: ‘Netanyahu Is Leading to a Bi-national State,’” *Ynet* (January 5, 2014)。

^③ 参见 “Germany: Illegal Israeli Settlements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 Merkel,” on YouTube (March 24,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UnQNF-tAE>。

^④ 参见 PBS, “Watch President Obama’s Full Speech in Jerusalem,” on YouTube (March 23,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UnQNF-tAE>。

^⑤ 参见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Kerry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Global Forum,” on YouTube (June 4,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UnQNF-tAE>。

^⑥ 参见 AP, “Abbas Threatens to Dissolve PA, Let Israel Take Over West Bank,” *Haaretz* (December 4, 2010)。

^⑦ 参见 Anat Kurtz, “Changing Course and Discourse: The Intra-Palestinian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Lessons of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eds. Anat Kurtz and Shlomo Brom (Tel Aviv: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2014), 101-10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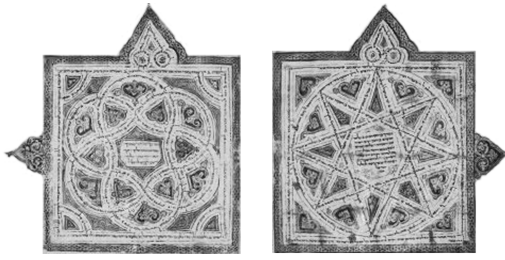
国前30年中巴以冲突的主要内容,但这种计划似乎从当代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消失了。目前,中东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数量之间形成的巨大差异尚未对巴勒斯坦有任何助益。由于诸多原因,包括社会内部因素和政治动荡等,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抑或愿意对巴勒斯坦的斗争作出除了言论和财政支持之外的承诺。即便情况并非如此,目前也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与以色列的战略实力相抗衡。因此,穆斯林兄弟会于2012年在埃及掌权时,尽管他们认为以色列和《埃以和平条约》同样都是不合法的存在,尽管他们原则上承诺要消除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但却表示不会发动战争或废除和平条约,因为埃及尚未强大到去做这些。^①

不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能够让某个地区人口统计数据的差距变得有价值,这一点并非不可能。冲突开始的100多年后,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仍然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现实,有一些人即使接受了也只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②虽然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在军事、外交和技术等方面的不平衡现象在未来不太可能缩小,但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确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发生。一个或多个阿拉伯国家拥有核能力的可能性不大,但仍有可能。美国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的联盟关系不太可能,但亦有可能,毕竟美国政治中曾经发生过更不太可能的事。阿拉伯世界再次出现大规模团结和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投入也不太可能,但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唯一一个即使在理论层面尚也不会改变的不平衡因素就是人口统计数据。即使世界上散居的犹太人都返回故土,抑或以

① 2011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运动成立了自由与正义党作为其政治分支。该党派沿用了四年前起草的《纲领》,声称致力于“维护呼吁人民之间进行合作、造福人类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在同一份文件中还有一条警告,为取消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铺平了道路:“两国之间的协议和条约必须为人民所接受,如果这些协议和条约不是基于正义,服务于(签署协议的)双方的利益,并得到认真和诚实的执行,就不可能为人民所接受。”国际法允许当事各方根据这些条件重新审查协定和条约,这是国际关系中公认的程序。因此,该党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在前政权下批准的各领域的诸多协定。参见 *Barnamaj Hizb al-Ikhwan al-Muslimin*, IslamOnline.net, 8, 22。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穆罕默德·巴迪奇(Muhammad Baddic)认为与以色列的和平不符合伊斯兰教令,呼吁埃及为来自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做好准备,并表现出毅力和克制。他同时指出为捍卫伊斯兰教而反对以“虚假和平”为借口策划的阴谋,是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他还声称,废除和平协议“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以色列宣战”。参见 Muhammad Badi', "Faridat al-Salam fi al-Islam," [www.ikhwanonline.com/article? ArtId=63089&SecID=210](http://www.ikhwanonline.com/article?ArtId=63089&SecID=210)。

② 令人惊讶的是,在2007年4月发表的一项关于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泛阿拉伯调查中,67%的摩洛哥人、54%的科威特人、74%的巴勒斯坦人、76%的约旦人和74%的阿尔及利亚人回应称,即使巴勒斯坦人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阿拉伯世界也不应该承认以色列是中东的一个犹太国家。这项民调由“Mashru' Miqyas al-Ray al-Amm al-Arabi”组织,抽样调查了1431名约旦人、1270名巴勒斯坦人、1300名阿尔及利亚人、1277名摩洛哥人和750名科威特人。参见 *al-Majalla* No. 1,416 (July 4, 2007): 26。



色列犹太人家庭的平均子女数量扩大三倍,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人仍远远多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在其他方面明显强盛的情况下,这种差距不甚重要;但若双方在其他各项实力方面都更加平衡,这种差距可能就变得很有意义。于是,巴勒斯坦认为4亿多阿拉伯人碾压不到1000万以色列犹太人的那一天定会到来就似乎是常识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会向有益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的信念也是合理的。

三、结论与相关的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巴以冲突涉及的是权力平衡方面的一种特殊现象。一方面,除了一个关键因素,以色列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较强的一方。自巴以冲突开始以来,以色列在军事力量、科技发展和外交联盟等方面的力量一直在稳步增强。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均势(约旦河西岸)与差距(整个中东地区)削弱了以色列的优势,并为巴勒斯坦的观念提供了可依据的基础,这一观念任何巴以之间认为现状的改变都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的实力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弱。

由此,上述分析具有哪些政策方面的价值?首先,应揭开导致巴以和平的努力屡次失败的神秘面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的原因并非巴勒斯坦不清楚何为最佳利益,抑或妄想、缺乏谈判技巧,也不是特殊的政治环境因素。相反,未能实现和平的原因植根于巴勒斯坦人理性的(可悲的)计算,这种计算让他们相信虽然现下是冲突中弱势的一方,但他们在未来地位会提高——即使是他们中的持温和政见者也坚信这一点。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里血腥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和平倡议有望实现之时,而在僵持阶段的双方关系却相对平和。

如果这种平衡和不平衡的复杂现象是实现巴以和平的主要障碍,那么就需要作出可以突破这一瓶颈的改变。为了质疑上述计算的有效性,即以以色列可能参与的任何全面暴力升级的结果都将损害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应该以政策向巴勒斯坦表明,任何因巴勒斯坦教条主义引起的敌对行动都不利于巴勒斯坦外交诉求的实现,即使它会导致以色列重新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巴勒斯坦领导人需要明白的是期望作为犹太人民族家园的以色列国灭亡的目标是不现实的,现如今是说服他们采取更切实可行的议程的时候了。

为了尽量降低人口差距造成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应该让以色列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些代表数亿人口的国际联盟。虽然成为这些西方联盟的正式成员本身并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但它能降低人们以人口统计数据为依据,将人口相对较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少的以色列视为一个脆弱之国的观念。虽然这一提议听起来有些牵强,但相信美国在不要求以色列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就将其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或美国这一做法不会引起约旦河西岸的大规模抗议亦是如此。

如果这些步骤确实破坏了巴勒斯坦的教条主义,那么国际社会就有了更好的身份来对以色列政府强有力地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深远的让步,接受关于巴勒斯坦独立的、可行的、有意义的形式。与此同时,无论其他国家做什么,以色列都应避免采取那些不可挽回的损害今后解决巴以冲突前景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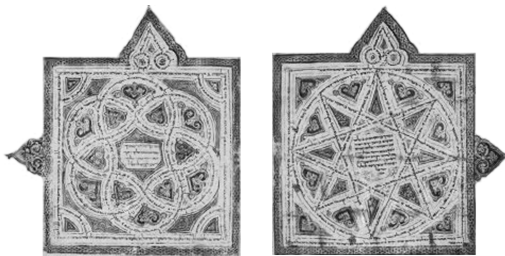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四、《亚伯拉罕协议》签订后的反思

上述文章的主体部分包括其中的政策建议,首次发表的时间比《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要早两年半。该协议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于2020年9月15日签署,主要涉及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苏丹这四个阿拉伯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在不同层面)。有读者对本文表示赞赏,认为它预测了《亚伯拉罕协议》签署的可能性,或者说《亚伯拉罕协议》反映了本文中策略建议的主体思想。令人遗憾的是,这只说对了一部分。《亚伯拉罕协议》提出的是一个简单的交换方案。当时,以色列的右翼政府为政治生存而苦苦挣扎,因此放弃了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以换取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面外交关系,并认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将效仿并跟进。

《亚伯拉罕协议》的双方都没有作出多少让步。尽管有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且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甚至支持犹太定居点),但以色列政府当时已经意识到,单方面的吞并对以色列而言好处不多,损失却大。以色列民众对单方面的吞并也毫无兴趣,但此举可能造成以色列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冲突,以挽救特朗普混乱而不得人心的团队。

在阿拉伯国家方面,除苏丹外,《亚伯拉罕协议》只不过是将其与以色列之间已存在多年的、牢固的、半隐蔽的关系(特别是在安全事务方面)正式化而已。签署协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向加入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承诺将给予其外交或军事方面的回报,此举同时向伊朗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受到它威胁的逊尼派国家比它想象的更神通广大。

尽管突破巴以冲突的瓶颈并非协议签署者和调解方的主要动机,但一个看起来合乎逻辑的假设是,《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改变停滞不前的“双重不平衡”困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协议的签订让巴勒斯坦人大为震惊并意识到,阿拉伯世界已经厌倦了他们的痴心妄想和说三道四,不愿再将以色列视为该地区的临时定居者。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现在作出最终评判为



时尚早,但很显然,《亚伯拉罕协议》迄今未能促成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方面的转变。如今,结束巴以冲突的最终协议的达成仍然与三年前的情况一样遥不可及;甚至从目前的情形来看,重启巴以双方的直接谈判都不现实。原因在于,虽然《亚伯拉罕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并不是一个足够大胆和实质性的步骤。事实上,在签署协议时,几个阿拉伯国家就明确表示,它们不再为巴勒斯坦一厢情愿的想法买账。这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巴勒斯坦任何一条雄心勃勃、构思拙劣的政策背后都再没有“阿拉伯世界”的支持。然而,这一信号还没有达到临界量的最重要原因是支持《亚伯拉罕协议》的沙特阿拉伯并没有正式加入这一协议。

其次,许多以色列人接收到了错误的信息。去新国家的旅行与访问让他们眼花缭乱,以至于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已成过去,即使不解决这个问题也依旧能实现以色列持久的和平与繁荣。这可能并非美国政府中某些人的意图,但特朗普的言论几乎没有让他们往反方向想的潜台词。

然而,巴以冲突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改变,在未来也不太可能改变。它的双重不平衡现象仍然是解决冲突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巴勒斯坦完全放弃要彻底消灭犹太人民族家园的目标之前,情况都不会有所改变,而以色列人却深信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届时,以色列就需要作出必要的,甚至痛苦的让步以便巴勒斯坦实现真正意义的独立。《亚伯拉罕协议》虽然没有导致这一结果,但却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新思路。